

“世间再无陈忠实”，当忠实先生带着他“压棺材底儿”的《白鹿原》作别人世，伤悼和悲情从文学界一直弥散到民间。作为新时期文学史上唯一被各方允为巅峰之作的《白鹿原》，从初刊到今天已有二十余年。忠实先生的离世，必将在民间掀起阅读《白鹿原》的新热潮，那么，借用卡佛那个著名的说法，当我们阅读《白鹿原》时，我们在阅读什么？

一定有人回答：“我在阅读经典。”是的，《白鹿原》是经典。可是为什么对经典的潮流性阅读都一定伴随着一个文化事件，比如死亡，比如获奖。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还有没有为数甚众的“门下走狗”甘愿集结，王小波还会不会成为一个文化英雄？如果莫言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对于莫言的了解是不是还止于张艺谋改编了他的《红高粱家族》，我们还会不会想到去高密东北乡的管家老宅沾沾文气？在一个人均阅读量相当贫瘠的国度，潮流性的阅读很难是自觉的文化行为，而更像这个时代带有消费狂欢性质的行为艺术。

陈忠实先生去世后，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最多的，是与他有过一面或数面之缘的人煽情的追忆，配上合照还有签名书，逝者就这样成就了生者荣耀的资本。这是庄重致敬的方式吗？我想起两周前，看到一个关于科比退役的帖子，在一片致

近期被各种刷屏的国产电视剧《欢乐颂》，无疑是《欲望都市》的又一次本土化尝试，本来以《粉红女郎》为对照坐标的观众，追着追着，却发现它俨然变成了成人版的《小时代》，五个职业女性成长互助的故事急转直下，变成了一出狗血大戏。

单在《欢乐颂》几位主角的关系中，就产生了划分阶级的两重标准：第一重是财富，或者叫资本；第二重，则是文化、素质，或者叫人力资本。这两重标准紧密交织，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后者经常作为前者的掩护，甚至正在逐渐压倒和取代前者，成为阶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这部剧集的阶级金字塔中，看似洞明世事却不泯真心、实则羡慕虚荣嫌贫爱富的“凤凰女”樊胜美在最底层，因为听不懂知识精英高谈阔论而惨遭出局的“富二代”曲筱绡在第二层，位于顶层的则是以安迪、奇点和赵医生为代表的所谓“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他们要么是高知海归，要么既懂天文还会引用诗经向女友示爱，光顾的每个娱乐场所都是“朋友开的”，要么边听德沃夏克边看东野圭吾……他们凑在一起的集体活动是：分享书单，谈论莎士比亚和王小波。

在樊胜美的故事中，穷是她无法突破的玻璃壁垒，酒桌上对着脑满肠肥的土豪赔笑的她，却从来不曾真正融入那个她向往的阶层；她的虚荣、拜金却给了玩弄她再罚她出局的人以借口，通过“穷不可怕，贪才可怕”的论调给来大城市打拼的“凤凰女”污名，从而名正言顺地揭穿她，看她笑话。

国产剧中不乏樊胜美

【热点冷议】

朋友圈的谈资 当《白鹿原》成为

□马兵

敬和致青春的跟帖中，突然出现了“科比一路走好”的字样，并配上几个双手合十的图案。显然，发帖者完全不了解篮球，只凭借惯性的词语判断，以为是科比死去了，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感的一幕！在消费主义和全媒体的语境之下，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包围着，并且对之做出微妙的服从，层出不穷的热点让我们应接不暇，而了解这些热点话题又等于在社交平台上的自我禁言，于是我们浮光掠影，我们蜻蜓点水，甚至道听途说、不懂装懂。而潮流

性的经典阅读与之何其类似！开卷有益本是好事，但如果这个经典阅读从开始就只是出于简单的从众心理，而没有起码的探知欲、判断力和鉴赏力，那么经典的涵洞意义根本就无从显现。因此，在阅读《白鹿原》时，我们必须对流俗的心态做出抵抗，明白这部书不是朋友圈的谈资，不是速朽的话题，也不只是塑造我们修养谈吐的象征资本，它是一部生命之书，需要调动我们的热诚和耐心。借用卡尔维诺的说法，“经典是我们道听途说自以为知之甚多，却在真正阅读时发现它们愈加独一无二、出乎意料并且独具创意的作品。”

也许有人回答：“我在阅读‘秘史’。”“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的一句题记。什么是秘史？我们又该怎么进入秘史？似乎在我们的语境里，“秘史”总是带有情欲缤纷的意味，我已经看到有媒体翻出当年《白鹿原》参与茅盾文学奖评奖时的插曲，刻意在所谓的节本和全本之间营造暧昧，再加上此前王全安电影版本中对田小娥等形象原欲特质的突出，使得不少人将秘史的解读放在了情色的猎奇之上。小说的起点是白嘉轩的六娶六丧，历史在小说中有时也确实是以肉身化的方式呈现的，但是性与生殖毕竟只是小说广阔的民间话语中很小的部分，忠实先生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揭示了20世纪的中国民间怎样通过生活的日常实践，而非仅仅是政治的手段去展开与历史的各种各样的对话。

可能有人回答：“我在阅读一部新历史主义的著作”或者“我在阅读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等等，这种回答隐含着一种知识论的确信，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标签式的断语往往意味着对对象丰富性的删繁就简，而且我们发现越是潮流性的阅读，标签化的现象就越突出。比如《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品格毋庸置疑，但也不要忽略了这部小说充盈着大量的关于异事的段落：灵动的白鹿的传说、惊恐的瘟疫、难解的梦境、小娥的鬼魂如何上了鹿三的身体、朱先生令人称奇的未卜先知……这些异事恰恰是不能被现实的理性所解释的。当然，我们可以再给它贴一张“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可是这些异事为什么不能理解成本土志异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而一定要是拉美文学远渡而来的启发？因此，阅读时要记得保持开阔和纤敏的理解，而不是削文本之足以适知识之履，鲜活的阅读感受、被文字激发的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

当我们在阅读《白鹿原》时，我们到底在阅读什么？我们在阅读一本书，也在阅读自己。

【观影者说】

如何给观众 写一封情书

□韩松落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上映以来，赞美和批评陆续出现，但《不二情书》纵有若干BUG，有一点非常值得赞美，那就是编剧兼导演薛晓路在一个文艺作品努力追求“白”和最大公约数的时代，写和拍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不论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其实都有点像写情书，见天地、见众生是后来的事，起初的出发点，都是给二三知己或者一小撮目标人群写情书。这情书，是对对方的迎合、取悦、评估（甚至高估，李银河曾说“爱就是对对方的高估”），是真正奢侈的高定产品。问题在于，情书写给谁？写情书的对象，决定了情书的肌理、取向、趣味。

大部分人对情书的接受对象没有把握，于是倾向于把这封信写得尽量“白”。所谓“白”，就是浅白、直白、空白，不设置任何理解上的障碍，在人物设定、故事设计各个方面，都取消任何特性，人就是男人、女人，职业身份至多是白领、商人、学生，故事就是各种套路的组合。总之，不能特别，不能有特性，不要有记忆点，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读者和观众的基数，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这种“白”是一种对对象的评估：你们必然是惧怕障碍的，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提炼出共通情感这种能力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这种“白”是因为创作者本身就是个“白人”，情感浓度不够，生活经历欠缺，生活顺风顺水，对世界的想象力极为有限。都市题材尤其是都市爱情题材的国产片，是“白人”重灾区。

《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不够“白”。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华人月子中心，女主角是赴美生子的二奶，场景和人物都特别；第二部《不二情书》更不够“白”，女主角是澳门赌场女荷官，男主角是美国的房产经纪，两人凭借书信往来建立起感情，这很特别；从两个人尤其是男主角罗大牛的工作圈，又引入了华人大流散这个话题，这更特别，更别提《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读书会、老爷爷那些引经据典的书信。这在许多创作者看来，都是特别之处，都太文艺，都是障碍，足以让观众畏惧。换个编剧，这些都得改，两人的身份全得改成没有具体工作内容的白领，《查令十字街84号》得改成《唐诗三百首》。

事实上，从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票房和话题热度来看，观众居然接受了这些特别之处，电影上映后，连《查令十字街84号》都迅速上了几大图书网站的热搜榜，就是说，创作者过去可能低估了观众，用无处不在的“白”来迎合他们，可能适得其反。但《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的成功，绝不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在最重要的地方够“白”，够普世：在描绘人的基本情感这方面，它是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的。不论焦姣和罗大牛，还是文佳佳和郝志，都有正常的感情需求，自我非常鲜明，“三观”易于理解。而且，对这种基本情感的描绘，完成得很好。

所以，即便焦姣和罗大牛的身份、环境再特别，《查令十字街84号》再小众，都不要紧了，因为他们的感情是大众的，已经携带最大公约数，这些小众元素，反而让他们的性格更鲜明。而那些努力追求“白”却最终无人喝彩的小说或者电影，在各种设定和细节上是容易理解了，但在对人类情感需求的描述上，却支离破碎、突兀离奇，难以理解，于是乎，所有的一切就成了障碍，即便主人公名字就叫“人”，捧读小学语文课本，观众也会觉得过于文艺、深奥。说到底，还是情书技术过不过关，对情书对象的反应有没有把握，还是创作者的小宇宙是否饱满、是否成熟。《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编导的小宇宙显然已经成型，她写给观众的这一封情书，态度端正，感情饱满，面面俱到。



【第三只眼】

中产阶级的自我意淫 《欢乐颂》

□薛静

这样被污名化的“凤凰男”、“凤凰女”（《新结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中都有典型的“凤凰男”形象），他们往往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父母“无能”又有大家长式的强势，观念保守，重男轻女。“凤凰男”、“凤凰女”们虽然在大城市立足，却无法

摆脱原生家庭的“榨取”；另一方面，出身寒微让许多凤凰男女自卑心和自尊心都极强，会经常因为“死要面子活受罪”而让人觉得不值得同情。

但比起这一群体自身的缺点，个体无法左右更无法逃脱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才更应该受到关注，正如樊胜美自己所说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面对这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宿命”，除了要求“凤凰男”、“凤凰女”们摆正心态、靠自己的清白努力改变命运之外，是否也应反思一下，如何才能给每个个体更平等的受教育、就业机会，让他们不需要一直背负这个原生家庭的宿命。

如果说“凤凰女”樊胜美和“富二代”曲筱绡之间的阶级差异一目了然，那么，曲筱绡和安迪、奇点之间的阶级差异则更加微妙。在这里，钱不再是入门唯一的通行证，你还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雅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比如经常光顾室内音乐会、周末去农场吃有机蔬菜、能随口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但在教育和这些“习得的品位”背后，怎么可能没有金钱作为支撑？

诚然，教育的结果由复杂的原因共同作用而成，既包含先天的资质，也有后天的努力。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方式，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这些投入对教育的结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试想“高大上”的安迪如果不是从小被领养到美国，而是在她的故乡小镇黛山长大，那么她驰骋华尔街的机会有多大？上一代人的经济积累，通过同一种价值转码的

方式，转化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无论是欣赏音乐、阅读经典这类高雅趣味，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打扮，都透露着趣味的等级与社会的等级之间牢固的对应关系。品位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起着维系群体边界的作用，标识着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

比曲筱绡的飞扬跋扈更令我反感的，是安迪和奇点对于他者人生居高临下的评论和指责，这样的对白几乎以一种正面说教的形式频繁出现在剧中。这无疑是一部被中产阶级价值主导的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这一新兴阶级不断成熟的自我意识以及为寻求更大的话语空间所做的努力，但剧中人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自我意淫。现实中的中产生活充满了风险、焦虑和不确定性，而这种焦虑是无法通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缓解的。

作为一部描写都市女性的作品，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的同时，它仍在不自觉地暗示：只有成功的女人才配有爱情，才能收获幸福，在努力突破性别壁垒的同时，却加重了阶级分裂。《欲望都市》中的友谊与爱情也并非没有阶级的底色，租住在房租管制公寓的专栏作家Carrie嫁给了华尔街的银行家Big，律师Miranda的老公则是一名酒保，但阶级并没有成为他们相爱的障碍，成功也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对于都市题材国产电视剧，还是对于现实都市生活而言，更自由的个体生存环境和更多对于他者的包容，都是我们所欠缺的。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